

方法与问题

□米川

近年,两篇出自中国顶尖985高校的经济学论文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,却意外遭到网络群嘲。一篇证明了“儿童早期遭遇洪水,会降低他们的受教育年限”,结论是:洪水影响教育;另一篇证明了“空气污染越严重,P2P借款人越容易忘记还款”,结论是:雾霾让人“健忘”。两篇论文均采用“作者付费发表”模式发表在爱思唯尔(Elsevier)旗下的期刊上,也都获得了所在学校的宣传。

细看这两篇论文,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:方法极其复杂——双重差分、工具变量、稳健性检验……但问题极其简单,简单到像网友所说“这不就是‘饿了要吃饭’吗?”“我奶奶不用做研究都知道!”用复杂的数据模型、高级的统计方法,并且花钱发表去证明“正确的废话”,从顶刊论文到被全网群嘲,说明了什么?

姑且不说学界那“publish or perish”所催生的畸形学术产业链,也不说被KPI规训得甘愿“自我收割”的学术臣民以及所衍生的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,这种学术论文显然属于典型的“方法与问题”倒置的“精致的平庸”,流溢着学术研究的荒诞和知识的异化,以及大多数人“清醒地”用公共资源和个人才智参与的某种“平庸之恶”。

“精致的平庸”看上去“很学术”,实证、计量、规范,却悬置了“真正的问题”。恰如米尔斯所批评的“抽象经验主义”倾向:只热衷做大量量化调查、问卷分析,方法精致,却对真正重要的社会问题保持沉默;学术越来越像一场圈内人的自说自话,严重缺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,所谓的研究进入了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,热衷于“非必要研究”,深陷各种“规范的陷阱”。

“精致的平庸”折射的是“法术情结”作用下的“方法拜物教”,以及那种螺蛳壳里做

道场的“学术微雕”,很容易滑入“为方法而方法”及“rubbish in, rubbish out”的窠臼。其带来的功利“贴现”也会滋生学术界的“造词”和“黑话”等文字幻术,如消费左移、价格敏感型消费者、待富人群、刚需后置等。维特根斯坦说“哲学是一场与语言对我们智力的蛊惑的斗争”,针对的就是这种“语言蛊惑或魅惑”现象。

真问题是真研究的前提。一本正经地研究“虚假或无意义问题”,是学界骨子里对学术风险的自我防御和“保全”,是规避学术研究难度和不确定性的“认知卸载”(cognitive offloading),把关于“问题”的认知努力转嫁给“方法”,所谓的研究蜕变为方法驱动的、形式僭越实质的游戏。其实,解开循证范式的死结也简单,即把“证据与问题”的关系颠倒过来:“先找真问题,再找证据”,而不是“先找证据,再套问题”,实现从方法迷思到问题自觉的跃迁。以真问题为导向的研究,是融合主动性、反思性与价值性的高意识研究,即使在方法规训的结构性压迫下,也要捍卫主体性的自由。

当AI逐渐接管机械性工作时,人类的核心能力是界定真正有价值的、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知识的意义不在于方法的复杂程度,而在于思想的穿透力度。学术研究是用适配的方法去探究真问题,让知识照亮现实。好的研究应该像一棵树,根须扎进现实问题的泥土,枝叶伸向人类思想的天空。它不必刻意追求“国际认证”,而应首先回答“中国问题”;不必沉迷于方法炫技,而应回归思想本身的力量。

问题是“做正确的事”,方法是“把事做正确”。问题是“岸”,方法是“舟”。以手指月,“手”到底不是“月”。《金刚经》言:“不应取法,不应取非法。知我说法,如筏喻者,法尚应舍,何况非法”。此处之“不”是“去执”是也。